目　录

忆公孙先生……刘北岳（1）
韩文畦传……吴伯涵（13）
忆外祖父韩文畦二三事……熊季康（28）
张增尧传略……余农治（31）
忆先父张增尧二三事……张匀石（34）
内江名塾师罗仲武……傅科　整理（37）
和廖恩波在一起的日子……赖图南（44）
我和闻化鱼相处的两段时间……梅　英（52）
张大千轶事十三则……老　梅（57）
赵贞吉（大洲）年谱……黄世杰　曾孔恕（64）

我曾与杨虎城将军医牙安牙……蒋祝华（79）
画虎名家阎松父在内江……晓　初（83）
药王孙思邈曾来内江……余农治（86）
周恩来在内江买蜜饯……杨方德（88）

记余燮阳先生之论书……王恩洋（90）
老中医刘季常特效方几则……钟竹溪供稿　朱英整理（92）
记内江孩子剧团后期的演出……邓辅治（95）
慈敬堂始末……刘北岳　肖述良（106）

内江江华农场简介 …… 袁正铭（110）
抗日时期内江的保险业 …… 余盛钧（113）
杂糖店“同兴源” …… 黄江陵（117）
我经营糖业运销的回忆 …… 宋子麟（121）
内江往昔采风录 …… 邹作圣（141）
内江土匪黑话利用全民语的手法 …… 陈若愚（234）

在武汉中央军事训练班的一段经历 …… 余农诒　高允斌（245）

忆公孙先生

刘北岳

我家与公孙长子先生家为世好。我认识公孙先生在民国八年（1919年），那时我家住插剑山。这年公孙先生的父亲明斋公因被土匪追逃，在松柏寨堕城墙罹难。其时遍地是匪，不能再在乡间居住，他们举家并抬着明斋公的尸体来我家居住。公孙先生这时正在熊克武的一军系的颜德基司令部任参谋长。驻防川东北，从防地赶回奔丧。那时我九岁，听说他当参谋长，在我们小孩子眼里，他就是“大官”了。他家在插剑山住了两年，大约民国十年又才迁回老家去的。民国二十年，公孙从上海回内江，我于二十一年底跟他拜门学书法，二十二年公孙举家迁到成都，他自己无住宅，借住在桂王桥西街叔叔余龙（跃门）的公馆。我也跟他去成都学习。我跟他学书法，当然又得兼接待客人，尽洒扫应对进退之职。在成都跟公孙先生一年时间，每日傍晚随他与余龙先生去昌福馆“宜园”喝茶。可以说是朝夕相随。二十二年底余龙先生逝世，公孙先生于二十三年迁羊市巷，住年余，买东打铜街住宅。此后我虽然离开了，每去成都总去看望他，直到二十八年回内江。后来他去重庆医病，于三十年逝世。因与公孙先生有那么一段接触时间，耳闻目睹，对他有一些了解。现在简述如下。

公孙先生的父亲明斋公，是一位私塾教师，对学生管教极严。公孙居长，幼从父读，对公孙管教尤严。十几岁时，一次夏楚，被打得头破血流，他实在忍受不了，于是逃离家庭，经历了千辛万苦，都不回家。公孙在外，也结认了一些有志气的朋友，他后来考入了泸州川南经纬学堂。在入经纬学堂以前，他已初步觉察到清朝政府的腐朽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入经纬学堂以后，这种萌芽状态的思想，有了发展。经纬学堂毕业后，在泸州教过书，曾教过后任某省督军张祥麟的子女。祥麟子翼如，后为黄埔军校五期学员，民国二十二年翼如来公孙家，曾以唐太宗手迹托公孙代卖，翼如姐亦同时为公孙学生，后嫁某军军需处长裘建华，由于翼如的关系，我们也熟识。

泸州教书后，接着就是1905年在彭县领导大同军起义，失败后逃亡。1906年去荣县长山桥教书，在这里得识同盟会员黎清瀛，熊克武，入同盟会。所以他题喻大将军祠联中有“丙午（1906年）以还，同志皆后辈”（注）的话。

荣县教书以后，接着就是1909年由他及黎清瀛，杨维等领导的成都起义，公孙后来旅居成都时还同我谈到一些逸事。起义前他们分别潜伏在督院街附近，他潜伏在离走马街附近的东大街一个曾姓老板的旅店里，他们起义诸人常有来往。未及期，起义事暴露，许多领导人被捕，公孙一时不能出，仍潜伏旅店中，曾姓老板亦知他为革命党人，冒窝藏罪犯风险未去检举，公孙实深感激他。记得民二十二年公孙去成都不数日，就带着我去那家旅店看望曾姓老板，后也常有来往。曾老板的弟弟后在春熙路开和平

（注）：公孙长子题喻大将军祠联：“一击未中转而图南，丙午以还同志皆后辈；三全开始不堪言国，拿了若此惟我语先生。”

烟店，我也常常去他店上坐坐。

成都起义事败，公孙虽脱险，但缉捕“暴徒余切”甚急，他先去到彭县战友同盟会员杨白鹿（又名杨白根）家。杨曾经暗中撕下一张捉拿“暴徒余切”的布告。民二十二年杨向公孙谈到此事，公孙问过那张布告还在否？杨说“早已不在了”。杨白鹿与公孙是生死之交。民二十二年，一天，杨白鹿来桂王桥西街寓所，公孙见之喜极，专陪他去外吃西餐，这次连余龙和我都没有约同去，这是为了他们能尽情地畅谈阔别之情。杨住城南学道街，以后互相常探视。公孙晚年在成都的朋友中，只有肖翼之（书法家，时任曾南夫协利字号经理）和杨白鹿二人是常有往来酒叙的，除此以外，一概未主动应酬，别人来看了他，也不回访，同僚或部下请吃饭（必顺请余龙，有时顺带请我），他也不回请。记得当时成都三军联合办事处处长向育仁（也是熊系军人）专程拜访他后又单请他吃饭，互称公孙大哥，向二哥。但也不回访、回请。

再说杨白鹿。据公孙说，杨在成都同盟会员中是很有功绩的人。成都辛亥年巡防军哗变后，同盟会员中曾拟由杨出任都督之说，由于没有武装，当然不能与尹昌衡比，未成。其人耿介，民国以后，不愿与人同流合污，后以行医为业。民国二十二年我们去成都时，杨已一贫如洗，公孙经常接济他，有时我和肖翼之也送给他一点生活费。民三十五年，成都淘锦江掘窖银事，便是这位先生发起的。据杨对我说，反正后，杨有一定声望。当时成都有一告老退休的藩台，一日，请杨吃饭，席间，藩台与杨曰，张献忠逃离成都时，曾将大量金银珠宝窖藏于锦江河底，有档案可稽，并把他在任时取出的档案交给杨。并说，他认为杨是正派人，特别把这些档案材料交给杨，希望能发掘出来，对国有利，

如果这事淹没无传，让这些金银珠宝长埋地下，就太可惜了。杨以后并未掌到权，却存有这份档案。民二十五年，才有与公孙等人发起组织淘江委员会的事。但此事未得结果，由公孙及原熊克武部下的马昆山等人赔了钱。杨亲口给我说档案事，要我去看那个档案，我未去看。

再说公孙成都脱险后跑到彭县杨白鹿家，从此不敢用余切名字，遂改名为“公孙长子”。开始北国的逃亡生活。公孙先生说他改姓“公孙”是因为黄帝姓公孙氏，表明自己是炎黄子孙；“长子”之名，可以说是嫡系的意思，是华夏的正统。取这名字，是认为与“夷狄”有别。公孙逃亡生活未听详谈，现在看来，当时牒捕甚急，只能从边僻地方逃走，他以后去甘肃，经六盘山入陕西，再北入绥远。大概他就是从彭县进入岷山北上甘肃的。他在北国这段旅途当然是毕极艰辛，在《萧霜楼诗稿》中有不少这段旅途的记事、感时之作。此诗稿我曾读过，除少数外，多数已不记得了。以后我还请韩文畦先生为他作序，后再补叙。

辛亥年，他进入山西，领导山西反正，厥功甚伟。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我生平最大的贡献是在山西”。但是，山西阎锡山等排外。公孙说：“为了顾全大局，我才没有同他们干。我们当时还是有力量的”。“顾全大局”的话，他是反复说过。

山西反正以后，就南下了。民国元年在南京。在南京，有一次开会，会议结束时，孙中山先生和与会者一一握手告别，到公孙握手时，公孙握住孙先生的手不放，向孙先生说：“我不愿作其他的事，想办报”。孙先生说：好好好。后给了我三千元去筹办。有人说我是名副其实的“报（暴）徒”，是当时的四大“暴徒”之一。但筹备不及，钱已花了不少。不久，二次革命开始就回川了。民国二年回四川参加反袁斗争，倒袁失败，又逃亡。讨袁

时他任的什么职，没有说过。

公孙这次逃亡到南洋，是否有其他的任务，我不知道。只听他说在南洋生活艰苦异常，生蛇都吃过。几次谈到吃生蛇的事。可能在熊克武随蔡锷护国军返川时，公孙先生又才从云南方向参加护国之役。以后就在熊克武的一军系颜德基司令部任参谋长职。在颜部驻防川东北一带，公孙先生的二弟心如曾任防区内的渠县的知事，四弟圣达亦曾任过两任知事。这是我记得的。

在颜部任职之后，曾任熊军某路司令，民国十三年，熊军被四川军阀联合驱赶出川，经湖南去广东途中，公孙原在战争中受伤的足疾复发，被送到上海医治。熊克武，但懋辛及内江的喻华伟、陈瑞林等到广东后，都被蒋介石囚禁于虎门，公孙因去上海，得免于虎门之难。后来公孙对我说，“我如被囚，肯定我会自杀，受不了那样的对待”。公孙性躁烈，所以这样说。公孙性躁还有一些例子。如熊克武任督军时，一日去河里洗澡，（警卫远远跟着）见他部队的士兵数人也去洗澡，有一姓马的士兵举枪打老百姓的鸭子。熊探明连排番号回去将打鸭子士兵逮捕来枪毙了。被枪毙的兵就是公孙部队士兵，于是公孙酒后去督军署拍案大闹，熊未理他。公孙与熊屡以此等事相抗，因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甚好。他的性暴烈，不宽容人，还有我见到的一事为例：公孙吸叶烟，但不许人用他的烟杆吸烟，二十二年，有一次一位客人因不知他有此忌，用了他的烟杆吸烟，他当面将烟杆在膝头折断，使客人极为难堪。但懋辛、喻华伟也对我说过，“公孙的脾气就是太坏”。

到上海治病愈后，熊克武等已被囚于虎门，公孙当然不能再去广东了，于是开始卖字生涯。不久家眷亦接去上海。这是民国十四年以后的事了。在上海卖字为生数年，民国十九年左右，原

来在熊克武部队任司令的颜德基又在新编为十九路军的陈铭枢部任师长，公孙又去与颜共事，任副师长。陈铭枢于民国二十年七月参加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结果被红军打得大败，可能溃不成军，公孙又才退役为民。民国二十二年在成都替范绍增、罗君楠写了一篇寿序为杨森的姪儿杨汉域的父亲祝寿，末尾还落了他在十九路军某某师副师长的军衔。

从十九路军退役后，接着就从上海回内江，住佘家湾，即现“四一六”医院地址。这是民国二十年年底或次年年初的事。二十一年年底我就在内江经肖翼之、谢仿昭介绍向他拜门学习书法。

二十二年到成都后，仍以卖字为生。他的润格：

单条——六元四角

对联——四元

扇面——四元

双钩（用上等嗽嘛绫裱，蝴蝶装，檀木面架）——每本二百元（其中有魏碑体、有隨体）。

招牌——分尺寸，润格已记不清了。

但公孙的字卖得不多，尤其他的绫裱双钩本子更不好卖，主要生活来源靠过去的朋友、部下赠送一二百元、数百元不等。二十二年，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聘他为顾问，每月送了一些舆马费，别人送钱多的，他常回送一双钩本。

他在成都时，每日早餐后就写字，完成卖字任务，他便练写双钩。他的魏碑体，别人议论亦不甚高，而双钩不但盖世无双，并且是空前的。内江著名书法家余夔阳先生对公孙魏碑未尝有评论，而对他的双钩则赞不绝口；公孙对余的书法则极表推崇。双钩坚持每日练习，从不间断。他的诗：“日写双钩三百字，（其内容）半是佛经半艳情”，也是纪实的。

我在成都时，从他门下一起学习书法的还有温太炎（崇庆人，大学生）、陈某（乐山人），余若兰为巴结公孙也来学字（余内江人，以后通过各种手段成为建设银行总经理），刘神仙（崇云，二十一军“模范师”师长）的儿子刘某亦送礼拜门，但基本未正式学过。他教学都在平时闲谈中进行，不拘形式。

公孙还为我改个学号，我名恒阳，他说“恒阳是恒山之阳，恒山是五岳中的北岳，就改名‘北岳’吧”。于是我又有“北岳”之名。

他家一日两餐，第二餐在下午二三点才吃。写完双钩的日课以后，还有时间，便由我和其他朋友陪他打麻将，输赢极小，纯娱乐性质。中午必喝二、三两酒。午饭后稍事休息，阅书报，傍晚照例由余龙和我陪他去昌福馆“宜园”茶馆喝茶。“宜园”是内江人王植三开的，“宜园”茶馆的招牌就是公孙写的。这个招牌，还有一个跋语：

> “宜园”主人，植三同乡，深穷陆羽之经，而我亦有卢仝之癖。闲暇之余，日必一至，嘱题园额，欣然命笔。他日品茗相对，亦所以自赏也。

当时许多人对公孙这个跋语有所评论，认为对主人缺少应有的礼貌，连个“先生”，“仁兄”之类的应酬字眼都没有。而公孙之所以仅称“同乡”，是有他的道理的。原来王植三是内江一个暗娼王二妹子的哥哥，王二妹子因与某老太爷有瓜葛，王植三乃得某老的资助在成都开设这个茶馆。由此我还想起公孙有关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是公孙与内江朋友饮酒行令，酒令规定当令者作诗词对联，其内容应以在座者为题材。某次当令的宋笃初者，商人，能文，顺口成一联云：“余大伟人，别号公孙长子；王二妹子，自称老太夫人”。某老太爷亦在座，于事贴切，尽合准绳，

众皆叫绝。所以公孙看不起王植三的为人，仅称其为“同乡”，而且末句还说写了两个字也是为了“自赏”。其对王植三之看不起，尽表现在字里行间了。后来公孙对我谈起这副对联，也说作得好，并不以自己与暗娼相对介意。

刘师亮开的双龙池浴室就在“宜园”隔壁。去“宜园”喝茶的内江同乡很多，每日傍晚常来这里吃茶的有肖翼之、艾国英、苏敬武、苏相时、钟德刚、钟明远、罗伯鸿等，刘师亮也常来。

公孙先生和“诗婢家”的关系。“诗婢家”的店主郑伯英原系川军某部录士，退伍后寓居成都一陋巷，以裱背书画为生，常至桂王桥西街公孙先生家取件，有时由我持送，其人聪颖过人，装池精细，颇得公孙先生好评。后公孙先生迁居羊市巷，郑伯英亦于羊市街觅得铺面一间，由公孙先生书题“诗婢家”的招牌，名既典雅，工作又精细，可谓得先生之助，营业甚佳，驰名国内。

公孙为人，嫉恶如仇，他认为是坏人的，就决不理会。同来吃茶的孙某、张某、胡某等，听说这些人品德不好，凡遇到他们来茶座上，他就不说话，如内江人说的“脸一马起”，表情极为难看。又如他刚从上海回内江，看了旅省同学揭露内江地方恶势力“十五人团”的《奇哉怪哉录》后，对他们也极为痛恨。“十五人团”的头目李汉文为讨好公孙，为公孙母亲祝寿，公孙对这位客人理都不理。在颜德基部时，一个贪赃的征收局长戴矮子生日，公孙送去一联，曰“但愿得童子年年长；岂有不包袱滚滚来”。此人正高兴有参谋长送贺联，当众展开一看，弄得他狼狈不堪。

公孙每天写字、打小麻将、阅书报、坐茶馆，每日都定时进行这些活动，从不看戏、看电影。我于民国二十三年离开后，他大概还是照此日复一日地生活着的，因早习以为常了。

民国二十五年，他不知为什么又去重庆住了几个月。在重庆

时，公孙与罗伯鸿发起，有张峻高（纸烟商人）蓝一之（重庆长亭公园茶馆老板）参加的，由旅渝内江同乡会办的《内江周刊》，创办的宗旨旅渝的同乡要过问内江家乡的事，要扶持正义，打击邪恶的意思。发刊辞由公孙署名撰写。其词云："夫内江，固喻培伦与公孙长子产生之邦也，虽不敢高拟为先总理之香山、委员长之奉化，尚可自方为陈英士之湖州……"，公孙先生自视甚高，于此可见一斑。《内江周刊》刊出了十余期，约三月，无人专司其事和其他原因停刊。

《内江周刊》把蒋介石和孙中山先生并列，似乎对蒋颇尊崇，实际他对蒋极不满，发刊辞不过是一种敷衍。（编者按：公孙在谈了"委员长"以后，特别提到"尚可自方陈英士之湖州"，也是有极贬蒋之意的。因蒋于辛亥期间流落上海，投靠曾入同盟会的青帮头子陈英士，陈为了窃据革命果实，在陈暗使下，共谋刺杀影响颇大的革命领导人陶成章，而使蒋、陈都声名狼藉。此处用"尚可自方"，其言外音即陈之意已甚明，贬蒋之意亦甚明）我过去曾见许多黄埔军人来看他，谈话中他对蒋总呼其名，或称"你们委员长"。他对杨白鹿、余龙和我都不止一次讲过"蒋阴险，手段毒辣，难乎其为上，难乎其为下"的话。在他所作题喻大将军祠联下联"三全而后，不堪言国，零丁若此，憾我语先生"。他认为国民党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弄得国不成国，因为民国十八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一是蒋介石与桂系军阀、与冯玉祥，又接着与冯玉祥、阎锡山连年混战；二是其后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日渐扩大，在当时他看来也是蒋介石"误国"表现之一；三是不久日寇入侵东北。所以有此说法。他认为胡汉民、谭延闿、熊克武可以主持大政。他说"应由胡汉民，谭延闿主政，熊锦帆（克武）治军"。我前已说过，他

脾气暴躁与熊克武关系不好。但他还是认为熊是国家栋梁，可见他心底是无私的。公孙最恨汪精卫，他曾多次说："刺摄政王汪剿窃了名义"，"狐狸精窃了刺摄政王的名"。

公孙对共产党也缺乏认识，他认为红军闹革命是"内乱"。于民国二十二年他为杨汉域父母寿序中说："方今之世，内乱甚于五季，外患浮于宋明之末"，这个"内乱"，"外患"就是指共产党和日本。

公孙在重庆住了几个月又回成都，民国二十五年冬或次年春，又回内江余家湾小住，三、四月又去成都，患病，又回内江养病。时正发生"七·七"事变，国家前途堪虞，甚感抑郁并对国民党误国感到愤慨。民国二十七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飞机开始空袭四川，空袭警报时，他听到日本飞机的声音即口喊"倭寇，倭寇，飞机，飞机……"，遂神智不清。不久，病又加重。他的七弟余无外，留德学生，其时为重庆范绍增的修械厂任职，接他到重庆入医院治疗，亦无效。民国三十年逝世。享年六十岁。

公孙先生原配陈氏夫人，生长子公孙涛。陈夫人早死，公孙涛后来外出无下落，他和我同龄，在插剑山时，我们一起玩。陈夫人与公孙一起带着公孙涛回家奔丧，陈夫人为外省人，说话大家听不甚懂。公孙涛与我同龄，当生于宣统二年（1910年），推知公孙与陈夫人之婚，当在逃亡北国时期，生公孙涛亦在此时。

二配夫人鲍氏，奉节人，据说为鲍超后人，生子女甚多。

另一转房丫头，也姓陈，无生。

公孙先生有《肃霜楼诗稿》，多感时、纪事之作，诗稿包括《冬冬词》一百首，为艳体诗。冬冬原是他一个丫头，与公孙有私，纪他与冬冬间事，故名《冬冬词》。《肃霜楼诗稿》韩文畦

先生曾为作序，作序之事，乃由我介绍。现把二位先辈相识并韩为诗稿作序的事简述如下：

韩文畦先生为罗仲武师的得意门生，我于民国十五至十七年，亦从罗师读于寿溪桥，常听罗师称赞韩孟钧（文畦），因此我深慕其名，但无机会得一蒙面。民国二十二年我在公孙先生处得晤内江同福场同乡吴春帆，当时他在二十四军军部任军医，从吴处得知韩先生于二十四军边务处工作，因由吴介绍得识韩先生，并时有过从。一日我和吴春帆约二先生在少城公园吃茶，又去“努力餐”吃饭。他二人谈得很投机，公孙看过韩的文章，很赞赏。后来公孙为诗稿征序，我自请于韩，韩亦乐于为诗稿写序。这就是诗稿序中所说的，对公孙“予景其名，仪其人久矣，今年夏始以刘君恒阳之介相识于成都。望之山立，即之春和，聆其言如出肝鬲，相视而笑，意忘其驽然为一代故国也。居无何，先生谬许予谙文事，遗以斯稿，属之为解。爰熏沐端坐而浴诵焉。”这就是乡贤中素负名望的两位先生有交往之始。

公孙先生爱国热忱特令人钦仰，除上述诸如认为蒋“阴险、手段毒辣”，搞权术、误国，认为自民国十八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不堪言国”，日寇入侵，民族面临生死关头，他忧心如焚，抑郁成疾等。此外，兹再以为杨汉域父母双寿的寿序为例。前已说过，这个寿序是为范绍增、罗君桐两个川军师长、副师长写的，但他这寿序，不落一般俗套，而以保卫民族国家之任相期待，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此文虽事隔五十余年，犹能诵记之：

> ……翁之汉域君，乃随子惠而效命国家者也，苟能进而戒之曰：勿踌躇满志，任劳尽瘁，秣厉以待。他日者，鞭弭橐鞬与国际相周旋，使民不易姓，版图无二色。斯时也，虽

夜邑之俸，昼锦之愉，举蜀之人，相率而为翁上七十寿、八十寿、乃至期颐寿，吾知翁必无慊于心，予亦不复惴惴然为翁虑矣。蜡函之役，蹇叔之送其子曰："愿收尔骨于二陵间"；北狩之鉴，宋岳氏母之坚飞志也，涅其背曰："精忠报国"。幸翁若母，有以取焉。

我从公孙先生时间不长，他给我的印象是：爱国热情极高，为官清廉，嫉恶如仇，性情刚烈，不随俗浮沉，容易先入为主，自视甚高，有时甚至可以说达到异常傲慢的程度。

1986年8月10日于西林寺

韩文畦传

吴伯涵

韩文畦同志曲折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四川防区割据、蒋介石统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建国后拨乱反正。他能不断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终其一生，到一九八三年七月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八月八日《四川日报》发出讣告，中共四川省委称赞他，为人正直、严于律己，作风正派，生活简朴。高度评价他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忠诚朋友。

韩文畦是旧知识分子，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中，饱经世变。能不断追求进步，保持中国知识分子刚正不阿，见利思义的独立特行，从旧营垒中走向人民一面，实难能可贵。他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生都从事于人民有益的事，人民自然是不会忘记他的。

在艰困中成长

韩文畦（1895年—1983年）名孟钧（亦书作茂均），内江市人。其父韩仲勤原籍江津，常于资、内一带游方行医，三十余岁

时与资中郑氏结婚，郑氏时年十六。初于资中南街开设“同春药室”。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生文畦，1899年文畦四岁时举家迁居内江小东门外小南海，遂定居内江，以医业谋生。先后有子女十余人，成育者仅四人。文畦居长，幼体质孱弱而颖悟过人，其父甚钟爱，常用竹块两面书字，用细绳穿连，教其识字，再诵不忘，积累渐多，五、六岁开始浏览《三国志演义》、《聊斋志异》能知其大要，因家贫，未入塾启蒙。

一九〇六年文畦十一岁，入陈翔鹤私塾启蒙。次年即至楚省学堂（两湖会馆所办）学习，设有经学、史地、算学、体操诸科。经学教员罗仲武学识渊博、擅长古文诗词，卓有名气，人尊称为“罗大秀才”。尤长于朗诵，音调铿锵悦耳，能使诸生于抑扬顿锉中豁然贯通文理气韵，深为诸生钦服。县中青年俊彦，一时皆聚门下。同学有刘云程、周希禹、肖清永、李仲权、廖维中、钟白心等，互相砥厉切磋，经史而外，旁及老、庄、离骚、宋明理学，并广阅当时杂志，讨论康、梁、林、严、章、谭等的译著，韩文畦对张之洞《书目问答》尤三致意，为其后一生中搜藏图书不倦之开端。罗仲武师教学严格，循循善诱，为诸生扎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文畦文思敏捷，罗仲武常称赞其文古朴雄健，有汉文风格，同学亦甚佩服，罗师善教，诸生受益匪浅，终生铭感、称述不倦。韩文畦晚年对罗师尚念念不忘，为诗纪之云：

倜傥恢奇仲武师，沱江文翰此先知。

亲承义法真堪感，默味虚堂朗诵时。

这诗表现了深厚的师徒之情。其它如李仲权的《雅存诗集》亦有怀念罗师的诗多首，兹不赘述。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韩文畦因家贫考入内江县立蚕桑传习所、全部公费、结业一年，兼课国文教员陈古枝（系县中学堂教员）甚爱其才，旋即

卒业，学无所用。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内江劝学所廖明九委派文畦任郭家乡初级小学教员，旋即爆发辛亥革命。民国初成立政府，内江四乡不安定，文畦惟居家苦读。民国二年（1913年）因借书常与福音堂牧师黄传健（隆昌人）交往，黄识其聪颖敦品，且家境清贫，堪充牧师，介绍文畦去成都华西坝免试入神学系，值成都四川法政绅班招生，文畦报考被录取，遂决意弃神学而攻法学。文畦回内江向罗仲武师告别，罗深惜其才，不愿其投身当时政法界，遂加阻止。文畦去意已决，罗师就说："士各有志，你意已决，不可强留"。命文畦伸手责以手心四楚，文畦遵命，遂告辞本师而去。实则他一生好学不倦，未尝一日废读古典文籍。

四川法政学堂为培育一般政法官吏而设，毕业期三年，学员多为官宦富绅子弟，锦衣玉食，气派不凡。文畦敝衣处其中，澹泊自甘，勤学不倦，名列优等，且为全班中较年少者，时仅十八岁。每年寒暑假，常背负衣物书籍，持雨伞乙柄，徒步往来于成都至内江五百余里大道中，日行百里，咸菜佐餐，不分酷暑严寒，栉风沐雨，艰苦备尝。一次在途中受暑晕倒，幸被好心人相救，得免不幸，然不知救命者为谁，至老年亦不能忘其事。法政同学因其随身常带雨伞，戏称曰："韩撑花"（四川叫伞为"撑花"）。这无异暴露了取浑名的人，以劳动人民为卑贱者的偏见。文畦对此不介意，以安贫自乐。他青年时期的艰苦境遇，养成生活俭朴，不慕荣华，使他深知民间疾苦，决定了一生的理想和追求。

民国四年（1915年）韩文畦满廿岁，从法政学堂毕业回内江，其父韩仲勤久病去世，享年五十三岁，其母郑氏仅三十六岁，举家五口，生计艰困已极。时当民国初年，内江风习重视科